



Translation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Books: A Case Study of John Fryer'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1,2}REN Shuping

¹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²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April 25, 2024

Accepted: May 28, 2024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REN Shuping. (2024). Translation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Books: A Case Study of John Fryer'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3), 128–134,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16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16>

The paper is supported by Chongq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Project “Corpus-based Scientific Translation Studies of Kiangnan Arsenal” (Grant No. 21SKGH087); Chongqing Municipal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Commission Project “Translation and National Knowledge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Military Knowledge Production by 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 of Kiangnan Arsenal” (Grant No. YYK24230); Chongqing Graduat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ject “Dissemination of Translated Works by 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 of Kiangnan Arsenal” (Grant No. CYB23268).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upheaval,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began to explore the path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one of them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 of the Kiangnan Arsenal to translate and introduce Western books. John Fryer, a translator in 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 introduced Western learning to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achieving knowledge transfer;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he achieved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e founded *Ko-chih hui-pien*, a scientific magazine to cultivate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spirit among the public, and revolutionized the way knowledge was generated. Upon examining Fryer'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ranslation is not merely a language conversion, but a discourse practic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politics, power, and cultur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ing,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John Fryer; translatio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REN Shuping is a teacher at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er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Her email address is 591711889@qq.com.

翻譯與西學知識建構

——以傅蘭雅的翻譯活動為例

^{1,2}任淑平

¹四川外國語大學；²重慶交通大學

摘要：晚清政府在社會劇變的時代背景下開始探索救國之路，創辦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介西書是其中之一。翻譯館譯員傅蘭雅通過翻譯向中國引進西學，實現了知識的遷移；在翻譯過程中，融匯中西，實現了知識的再語境化重構；創辦《格致彙編》，培養民眾的科學思維和科學精神，革新了知識的生成方式。考察傅蘭雅的翻譯活動，可以發現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轉換，而是與社會政治、權力、文化緊密相連的話語實踐，在晚清西學知識的加工、建構和傳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關鍵詞：傅蘭雅；翻譯；知識建構

基金項目：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人文社科項目「基於語料庫的江南製造局科學翻譯研究」（專案編號 21SKGH087）；重慶市語言文字科研專案「翻譯與國家知識生產：基於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軍事知識生產的個案研究」（專案編號 YYK24230）；重慶市研究生科研創新專案「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著的傳播研究」（專案編號 CYB23268）。

一、引言

晚清時期，封建統治腐朽衰落，外有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內有各種矛盾激化，危機重重。為走出困局，清政府開始探索向西方學習科學和技術，1868 年創辦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介西學是其路徑之一。翻譯館譯員傅蘭雅（John Fryer）全心投入西學翻譯與傳播的諸多方面：在翻譯館先後譯書共計 77 種，占翻譯館譯書三分之一以上（熊月之，2010：415）；創辦科普期刊《格致彙編》，啟蒙普通民眾。筆者將結合文本與社會歷史語境，從知識翻譯學視角對傅蘭雅上述翻譯活動作出闡釋，以揭示翻譯在知識的加工、建構和傳播中的重要價值。

二、翻譯西學著作，實現知識的遷移

傅蘭雅所供職的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是晚清官辦機構，成立於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不斷深化對中國的侵略之時，其目的是通過學習西方先進的實用科技知識，實業救國、啟蒙民心。這一歷史背景決定了翻譯是與國家和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話語實踐，肩負著民富國強的重要使命。因而這一時期翻譯館的選材，如傅蘭雅所言（1880：13），「後經中國大憲諭下，欲館內特譯緊用之書」；而關於選材的具體操作，則是西人與華士共同選擇所「緊用者」。其中，「緊用者」指「政府認為急需引進的內容，包括學習西方的政法知識、便於仿造西方的堅船利炮諸如此類的經世致用之書」（韓淑芹，2021：83）。

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任職期間，傅蘭雅選擇性地翻譯了有益於中國的西學著作，據熊月之統計^①，共 77 種，所翻譯的書籍「涉及數學、物理、化學、礦物學、地學、工程、製造、軍事、醫學、社會學等學科，幾乎涵蓋西



方近代科學的每一個分支」(王紅霞,2006:2)。其中,許多著作是首次引進,填補了中國在該知識領域的空白。如,軍事方面,《英國水師考》《美國水師考》等譯著較全面地向國人介紹歐美各國的海軍規模、造船能力、軍事訓練等方面的知識,使國人對世界海軍的建設和發展發展有了初步的瞭解(皮明勇,1993:52)。工藝製造技術方面,《兵船汽機》《汽機新制》、《汽機必以》等譯著向國人輸入蒸汽機原理、製造方法以及輪船方面的知識,具有很強的實用性。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譯著較系統地介紹基礎科學理論方面的知識。總體而言,從軍事、工藝製造到聲光化電自然科學,傅蘭雅對西學著作的譯介豐富了中國本土的知識體系,拓寬了國人的知識視野。

在被西方堅船利炮敲開大門的晚清中國,西學經過翻譯遷移至中國,發揮著重要價值。《防海新論》等海防著作譯介緣於中國海防意識缺乏、海防軍事壓力增強的社會背景,「啟蒙了近代中國的海防思想,並在軍事科技上發揮了引領作用,有效促進中國的海防建設」(張瑞嶸,龍心剛,2020:26)。《工程致富》《行軍鐵路工程》《開煤要法》《井礦工程》等工程科技方面譯著均是基於時代的迫切需求,「為生產直接服務」(熊月之,2010:431),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早期工業近代化。除了對早期工業近代化有直接影響的自然科學譯著,傅蘭雅的社會科學譯著對社會也有較大影響,「推動了中國知識界的思想解放,有力影響了當時的知識份子」(張美平,2010:42)。其中,《佐治芻言》是戊戌變法以前譯介西方社會政治思想最系統、篇幅最大的一部書,出版後曾多次重版,對中國思想界曾產生很大影響,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都曾讀過(熊月之,2010:408)。《佐治芻言》為社會思潮的變革奠定了必要的知識基礎。

綜觀傅蘭雅的翻譯活動,可以看出翻譯並非一種個人消遣,而與社會和歷史緊密相連。在晚清「自強」「求富」的歷史語境下,傅蘭雅的西學翻譯活動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互相呼應。而作為知識遷移媒介的翻譯,「既不是社會與政治發展的副產品,也不僅僅是社會與政治發展的結果,更不是文本與人互動的副產品,它是使得這些發展和運動成為可能的這一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Baker, 2006: 1)。

三、調適中西差異,實現知識的再語境化加工與重構

考察西學到達中國之初的社會歷史語境,有以下三點值得注意。第一,19世紀後半期,清政府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客觀上阻礙了中國與西方的知識交流。國人對「知識」的認知仍停留在傳統的孔孟老莊的「聖賢書」層面。知識是靜態的、穩定的、封閉的。第二,舊有的人才選拔制度——科舉制度決定了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在當時的主導地位,用傅蘭雅的話說(熊月之,2010:554),「如近來考取人才,乃以經史辭章為要,而格致等學置若罔聞」,難怪傳統士子「對與科舉考試內容無關的知識漠不關心,對近代社會發展所需要的自然科學和技術知識不甚瞭解,對外國發展情況更是一無所知」(陳超凡,2017:66)。第三,從知識體系本身來說,西學與中國傳統知識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系統。聲、光、電等西學知識是人類通過觀察、實驗獲得的經驗知識(empirical knowledge),是外在的「聞見之智」;而中國傳統知識則是注重人的道德品行修養的知識,是內在的「德心之智」(陳超凡,2017:66)。

在此背景之下,西學知識經由翻譯、遷徙、抵達中國,這就涉及知識的再語境化,也是「一個地方性知識的世界性認同問題」(楊楓,2022a:2)。如前所述,中國地方性知識具有封閉性、儒學在當時社會居主導地位、西學與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存在差異,這就決定了西學知識與中學接觸之初必然遭遇碰撞、衝突、矛盾,而西學知識在中國成為普遍性知識則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經由陌生化學習、選擇性吸收和創造性重構」的過程(楊楓,2022b:1)。傅蘭雅對當時的社會語境、中西學之間的矛盾有清晰的認知,深知翻譯不只是語言層面詞句的轉換,而會「受到文化、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魏麗傑,2023:71)。於是嘗試調適中

西差異,按照 David Reynolds 的說法(1991:38),「把科學納入中國各傳統哲學範疇」,對西學知識進行了一系列加工與重構,使之與中國本土有機融合,成為普遍性知識。

在認識論上,傅蘭雅通過建構西學與中國實學的關聯對中西學之間的差異進行調適,以爭得西學在中國的合法地位,促進西學在中國的吸收和認同。實學,指踏實而有根底的學問,實用的學問。實學以「實體達用」為宗旨、以「經世致用」為主要內容。中國實學思想始於宋代,於明清之際達到高潮,是儒家思想發展的一種理論形態。歷史上,實學的內涵幾經流變,但其內核始終不變,那就是崇實黜虛、經世致用。在晚清,西學雖不能完全等同於實學,但二者在價值觀、方法論等方面確有相通之處。傅蘭雅曾言:「想要擴展(西學)知識,首先必須考證。若想考證獲得成功,必須踐行實學」(轉引自 Reynolds, 1991: 42)。實學到考證再到知識清晰地揭示了獲取知識的路徑以及知識與實學之間的緊密聯繫。由此,傅蘭雅成功建構了西學在中國社會語境的合法性。

此外,傅蘭雅堅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發展的眼光看待漢語,為利用中文傳達西方知識以及融匯中西的翻譯策略建構了必要性和合理性。語言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傅蘭雅所說,「使中國幾千年來團結在一起、從嚴重的民族災難倖存下來、對鄰國造成有益的影響、吸納她的征服者而不是被征服者吸納的原因之一,毫無疑問是她廣泛傳播的語言和文學」(戴吉禮,2010:360-361)。因而,面對伴隨列強軍事侵略而進入中國的西學知識,充分利用漢語的力量,即以西學中譯為路徑是學習西方先進文明的最優選擇。除此之外,在傅蘭雅看來,通過西學中譯學習西方知識也是出於現實的考慮,中國知識階層的「自滿文化心態」導致鮮少有人願意學習西方的語言(Bennett, 1967: 69)。與此同時,漢語是與時俱進的語言,是「活的語言」(戴吉禮,2010:361)。在漢字的發展進程中,「很多字的意思發生了變化或者棄之不用了,又另外造出了許多新字」(同上:361)。在表達能力方面,傅蘭雅指出「漢語術語不僅能表達西方科學知識,也能適應科學發展」(同上:379)。

基於上述認識論,在翻譯策略方面,傅蘭雅採用「化西」(張景華,2018:28),也即融通中西的策略,對西學知識進行加工與重構。首先,傅蘭雅融通中西的翻譯策略體現在詞彙層面的科技術語翻譯。我們知道在西學知識翻譯中,科學術語的翻譯是核心,「術語是知識的濃縮和載體」(蘇豔,2023:77)。面對層出不窮的泰西格致新事新理,傅蘭雅主張採用外來與本土相結合的方式翻譯術語,以促進西學知識在中國土壤的接駁。傅蘭雅(1880:12)指出:術語翻譯中,擬定西學「名目」,首先應沿用「華文已有之名」,若字典裡沒有,則可查閱中國已有之格致或工藝書,又或者可以諮詢中國客商或製造或工藝等業內人士。如漢語中確無該名,需另設新名,則首先以漢字外加偏旁。突出的案例是化學名詞的漢譯,如我們所熟知的鋁(aluminum)、鎂(magnesium)、錳(manganese)、鉀(potassium)、鈉(sodium)、鈾(uranium)、鋅(zinc)、鈣(calcium)、鋇(barium)、砷(arsenic)、碘(iodine)、鋰(lithium)、鈮(vanadium)、鈦(titanium)等化學元素就是通過採用漢字加偏旁的方式而產生的。新名的音和形均與漢字有相似相通之處,能切實幫助讀者在心理上減少對外來新知識的排斥以及在認知上對知識的理解障礙。其次用描述的方法,言簡意賅地對新術語作出解釋。如用視覺上生動形象的「火輪船」對西方工業革命中新興的蒸汽輪船(steam-boat)進行描述,以減少國人對西方知識領域新生事物的陌生感和疏離感。最後是「用華字寫其西名」,即採用音譯的方式對西名進行翻譯,如對有機化學名詞的翻譯,acetone 譯為「阿西多尼」、aldehyde 譯為「阿勒弟海特」、ether 譯為「以脫」等等(張濤,2000:298)。翻譯中採用音譯的方法,看似在中西學知識之間構築了一條鴻溝,在客觀上卻也有助於促進國人對知識體系的更新。

其次,在行文層面,傅蘭雅通過與華士合譯的方式使西學知識在行文上「合于中國文法」(傅蘭雅,1880:9),從而促進西學與中國本土的有機融合,促進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書採用西人與華士合譯的模式,西人「以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語,華士以筆述之」(同上:9);「譯後,華士將初稿改



正潤色,令合于中國文法」(同上:9);「有數要書,臨刊時華士與西人核對」(同上:9);「而平常書多不必對,皆賴華士改正」(同上:9)。這種「西人明西書之義——西人讀成華語——華士筆述——西人與華士核對——華士改正潤色」的「西譯中述」是「被動開放的中國在急需引進西學而又缺乏人才情況下的過渡時代」(熊月之,2010:423)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翻譯模式,卻在客觀上為西學知識在語言行文方面符合中國文法提供了保障,從而達到傳播和普及西學的目的。具體案例,如《防海新論》譯文中詞性的轉換。「The following treatise presents chiefly the results of the author's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in Coast-defence during the four years of the late war in North America」(Scheliha, 1868)譯為「花旗南北交戰之時,餘在南方身歷戎行者,四年于水師戰守之事見聞較廣」(傅蘭雅,華蘅芳,1874)。將英語中常見的名詞結構(此處為「the author's experience」)轉換為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的動詞結構(此處為「餘……身歷」)。再如在《佐治芻言》的翻譯中,傅蘭雅特別注重譯文節奏音韻與中國文法的契合,使譯文「多短句、多語氣詞的使用,不時有4-8字短語,四字格、對仗、排比小句、反問句、問答式短句、辭賦體均有涉及。如:明理修身,置之不問;不虞之備;猝遇慌歉;束手無策;坐待國家賑恤;兄弟同室操戈,自相戕害」(馬飛,2013:101)。這種形式規整、語言優美、符合中國讀者閱讀習慣的譯文為西方政治經濟學基本知識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篇章層面,傅蘭雅採用譯與評相結合的方式,有意識地介入文本,使西學在內容上、思想上、價值觀上更貼近讀者,從而促進西學知識的吸收。西學翻譯的原文本大多是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本,在體裁上屬於資訊類語篇,其翻譯以忠實傳遞原文資訊為主。然而,實際上,譯者並沒有一味地墨守成規,而是靈活地採用增譯、改寫等方法,「或增加情節,或發表議論」(廖七一,2010:95),助推西學知識的接受。如,「It was a set of ignorant, reckless men, with nothing to gain by good government, who executed the horrible cruelties of the first French Revolution」(轉引自馬飛,2013:101)。經增譯、改寫後,譯文為「法國第一次作亂時,此種頑民居然把持政柄,其性情之兇暴,行事之悖逆,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之亂,亦仍由此種頑民起事也」(同上:101)。譯者通過增加巴黎公社革命爆發的時間1871年這一背景知識,有效減輕了讀者的閱讀負擔;將中性的「revolution」改寫為具有貶義情感色彩的「作亂」,對戰爭進行批判,以獲得國人在飽受戰事之苦後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共情。又如,「Education will not insure virtue」(同上:101),譯為「每見世界之為父母,第知教子弟以文學,而于明理修身之本,置之不問」(同上:101)。譯文算不上傳統意義上忠實、對等的翻譯,「virtue」譯為「明理修身之本」,可將西學更好地融入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原文「not insure」成為「置之不問」,屬於譯者「個性化的發揮和衍義」(胡翠娥,2007:145)。譯者借此表達自己的思想與價值觀,那就是,教育的本質就包含提升個人的道德修養,而不應對品格素質「置之不問」,這與儒學精髓中的仁、義、禮、智、信,儒學注重修身養性的主張高度一致。

通過以上考察可以發現,在中學占主導的、相對保守的中國文化語境下,在西學與中學兩種知識接觸、交流的初期,傅蘭雅採用意譯、轉換、增譯、改寫等翻譯方法、融通中西的翻譯策略對中西差異進行調和,在詞彙、行文、篇章層面均對西學知識進行了加工與重構,使之在中國的土壤迸發出蓬勃的生命力。在此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翻譯「不是機械的文字變易,而是一種再創造活動」(劉雲虹、許鈞,2015:351);譯者也不是亦步亦趨的文字轉換器,被動地複製原文的文字與知識,而是「調停者」(Hatim & Mason, 2001: 223),是「協商者」(Nida, 2001: 121),能動地對各種變數進行調適與協商,在新的語境生產、建構新的共用性知識。

四、培養科學思維與科學精神,革新知識的生成方式

有學者指出近代以前中國在知識創新方面的不足與知識的動力生髮機制存在關聯:「中國傳統的知識

承載於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家知識體系，知識的生髮和接續以記憶、想像與傳承為主，知識創新意識淡薄」(蘇豔,2023:80)。也就是說，如果僅僅把知識作為一種穩定的、靜態的「死」知識進行傳授，那麼它的生命力將是有限的。

事實上，知識以及產生知識的體系是動態的、變化的、自我調整的。簡言之，只有把知識看作「活」的知識，才能推動知識的變革、生產和創造新的知識。在創新知識的過程中，科學方法、科學思維和科學探索精神尤為重要。對此，傅蘭雅有清晰的認識，因而在1875年《格致彙編》的創刊聲明中，他頗有洞見地指出「我要創辦一份中文科學月刊，通過介紹已經翻譯成中文的科學書籍、刊登關於科學論題的講座筆記、回答讀者來信和可能會引起廣泛興趣的科學問題，來傳播通俗有用的科學知識和培養這個國家的探索精神，從而使中國取得真正的科學進步」(戴吉禮,2010:3)。這表明由傅氏創辦的《格致彙編》在傳播西學知識、啟蒙民眾的過程中開始突破西學知識、西方器物的引介，而轉向思想層面對國人科學思維方法與科學精神的培養。

以1877年的「格致新法總論」為例，該部分包含了對歸納法的完整闡釋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新的科學方法的論述。培根指出，「人們獲得真正的科學知識必須去除各種幻想和偏見」(孫邦華,1994:60)。科學的方法才是獲取知識的正確途徑，「鈕敦(今牛頓)大有靈慧，司已猜度而能建立新學，……若指其光學、重學、數學、天文等，可識全遵此法而成矣。我確知鈕敦熟培根之書而從之，故獲大益」(慕維廉,1877:15)。掌握了科學的方法，便可觸類旁通，這是對科學方法的推崇，更是對讀者科學方法論意識的培養。又如，《格致釋器》中(1890:3)，譯自英國化學家 John Joseph Griffin 的「水學器」除了介紹力學知識、常用實驗儀器外，更闡明了近代科學在本質上是實驗科學的理念，「蓋格致為泰西實學，事理故屬本乎自然，考求不妨推陳出新。每講一事，必藉圖以名之，每驗一理，必藉器以試之。如此，則學者清見於目、明澈於心，格致之學不難考求也」(同上:3)。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圖表進行驗證、以儀器進行試驗，如此，新知識的獲得就不是難事。

此外，《格致彙編》非常注重對國民科學精神的培養。「算學奇題」等欄目以當時不常見的題目培養讀者認真鑽研、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科學家傳記」欄目，如，「美國傅蘭克令傳」對主人公的鑽研精神有過描述，「(傅蘭克令)幼喜讀書，長習印書之業，家中藏書無多，早已遍覽于印書房，所印之書無不翻閱，俱能通曉。日習工作，夜對書燈，每讀至半夜方歇。約十四歲時，自思一讀書之法」(1877:7)。正是由於傅蘭克令自幼刻苦學習、博覽群書、勤於思考，才造就了他令人矚目的科學成就，這對讀者無疑是一種激勵，激勵他們在追求科學真理的路上心無旁騖、砥志研思。

綜上所述，傅蘭雅創辦的《格致彙編》在幫助國人去除蒙昧、培養科學思維、塑造探索精神方面具有重要價值，革新了知識的生成方式，為知識的創新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結語

「翻譯因特定的社會服務功能被打上歷史的烙印」(趙國月,高曉仙,2024:122)，在晚清求富求強的背景下，翻譯與社會積極互動。作為譯者，傅蘭雅通過翻譯引進西學知識，豐富了中國本土知識體系，推動了中國近代化進程；翻譯過程中，傅蘭雅秉持會通中西的原則，對西學知識進行了再語境化加工與重構，促進了西學在中國的接駁；創辦《格致彙編》，培養國人科學思維和科學方法，革新了知識的生成方式，推動了知識的創新。從知識翻譯學視角對傅氏的翻譯活動進行考察，可以深化我們對翻譯本質的認識：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轉換行為，而是「一種知識遷移、話語重構與價值創造活動」(覃江華,2022:26)。

參考文獻

① Baker, M. (2006).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② Bennett, A. (1967).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③ Hatim, B. & Mason, I. (2001).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 ④ Nida, E. (2001).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⑤ Reynolds, D. (1991). *Redrawing China's intellectual map: Images of sci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 27-61.
- ⑥ Scheliha, V. (1868). *A treatise on coast-defence*. London: E & F. N. SPON, 48, CHARING CROSS.
- ⑦ 陳超凡:《王韜教育改革思想和實踐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頁66。
- ⑧ 戴吉禮(編):《傅蘭雅檔案(第2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頁3-361。
- ⑨ 傅蘭雅:《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格致彙編》1880年夏第三卷,頁9-13。
- ⑩ 傅蘭雅,華蘅芳:《防海新論》,上海:江南製造局1874年版。
- ⑪ 胡翠娥:《文學翻譯與文化參與——晚清小說翻譯的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頁145。
- ⑫ 韓淑芹:《國家翻譯實踐之「治」與「制」——以洋務運動時期官辦譯館翻譯為例》,《上海翻譯》2021年第1期,頁79-84。
- ⑬ 廖七一:《中國近代翻譯思想的嬗變:五四前後文學翻譯規範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頁95。
- ⑭ 劉雲虹,許鈞:《翻譯批評研究之路:理論、方法與途徑》,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頁351。
- ⑮ 馬飛:《傅蘭雅翻譯策略探析》,《安陽工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頁100-103。
- ⑯ 慕維廉:《格致新法總論》,《格致彙編》1877年春第二卷,頁15。
- ⑰ 皮明勇:《甲午戰前對西方海軍建設和情況的譯介及其影響》,《軍事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頁51-58。
- ⑱ 覃江華:《翻譯與現代知識話語建構》,《上海翻譯》2022年第3期,頁21-26。
- ⑲ 蘇豔:《嚴復翻譯中的知識建構研究》,《上海翻譯》2023年第3期,頁76-82。
- ⑳ 孫邦華:《寓華傳播西學的又一次嘗試——傅蘭雅在上海所編〈格致彙編〉述論》,《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5期,頁58-63。
- ㉑ 王紅霞:《傅蘭雅的西書中譯事業》,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頁2。
- ㉒ 魏麗傑:《後現代理論中的「他者」研究》,《翻譯研究與教學》2023年第1期,頁68-72。
- ㉓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頁415。
- ㉔ 王雯:《如何用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應對商務英語翻譯教學》,《英語研究》,2008年第1期,頁82-84。
- ㉕ 楊楓:《知識的地方性與翻譯的世界性》,《當代外語研究》2022年第3期,頁2。
- ㉖ 楊楓:《知識翻譯學:出發與抵達》,《當代外語研究》2022年第5期,頁1。
- ㉗ 張濤:《傅蘭雅的化學翻譯的原則和理念》,《中國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頁297-306。
- ㉘ 張景華:《「西化」還是「化西」?——論晚清西學翻譯的術語民族化策略》,《中國翻譯》2018年第6期,頁27-34。
- ㉙ 張美平:《翻譯一事,系製造之根本——江南製造局的翻譯及其影響》,《中國翻譯》2010年第6期,頁38-42。
- ㉚ 張瑞燦,龍心剛:《海洋強國夢的先聲:晚清西方海防著作譯介研究》,《中國翻譯》2020年第2期,頁26-34。
- ㉛ 趙國月,高曉仙:《抗戰背景下〈西行漫記〉譯者社會化行為探析》,《外國語文》2024年第1期,頁122-130。

(Editors: Bonnie WANG & Joe ZHANG)